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罗荣渠
著

美洲史论



美洲史论

罗荣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洲史论/罗荣渠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8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2152-4

I. 美… II. 罗… III. 美洲-历史-研究-文集 IV. K70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50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125

字数:357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5.00 元

痛失良史悼荣渠

——《美洲史论》序

李慎之*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现在为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作序的时候，他已经是古人了。

第一次见到荣渠是 1991 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讨论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的纪念的拉丁美洲学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立论正大，思路缜密，是一个难得的学者。订交以后，我们也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在广州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学会上，当时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溜会去参拜久已著名的南宗六祖的道场光孝寺与六榕寺，我知道他兴趣广泛，相约同行，回来几乎误了晚上的宴会。我与他的交情真可谓以会议始，以会议终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慷慨豪爽，童心未泯，而且生龙活虎的人。我比他痴长几岁，他视我为兄长，而竟会先我而去，真是世事难料、出乎意外的事情。今年 6 月，我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在坎布里奇作访问研究。有一天，北京大学的刘文澜同志因为要找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到我的寓所，闲谈中，我提到“你们的罗荣渠教授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不料她的反应竟是“他已经过去了”。我一时惊呆，久久说不出话来。直到我 8 月份回国以后才看到他的讣告，知道他是以大面积心肌梗塞，猝然病发，来不及救治而死的。

*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荣渠活了69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算,正合杜甫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年,说起来也不算短命了,但是按近年来的实际,以他的精力,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也并不稀罕,何况他的学术生命刚刚因为改革开放而进入新阶段。仅从这本《美洲史论》所显示出来的轨迹看下去,他实在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有更多的贡献。出国以前,今年1月,我还看到他写的《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今年2月,我又看到他写的《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虽然荣渠自己很明白预言历史是近乎办不到的,但是这又是负有创造历史的天职的人类不得不做的工作。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然而天不假年,遽然撒手,这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悲哀。

荣渠是在极“左”路线的时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从荣渠的遗作看,转折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以70年代末为分界线,前30年的国家目标是世界革命,后20年的国家目标是现代化。荣渠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美国和美洲的史学家,他前半期的著作主要是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后半期的著作则主要是讨论中国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志趣判然有别。但是,尽管如此,荣渠的学风还是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前期,他的文章也无不是论证细密,反复质难,看得出他对理性的要求显著地高出流辈,这一点只要一读《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这样的论文就可以了然。它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一味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相信,不管哪一种理论,只要你真正“坚信”它,坚持不懈地与事实对照,与其本身的逻辑对照,与自己的良知对照,有求是之心而无自欺之意,最后必然能凭借“人”所固有的内在理性的强大逻辑而接近真理。可以想象,荣渠在他锲而不舍、广征博采的追求中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开放改革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

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继续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作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

就在这篇文章中，荣渠还提到：“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好一个“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荣渠一定是深深感到了几十年来的斗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造成的伤害才说这番话的，然而真正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谈何容易，如果能够以10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就很不错了，这当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首先是主要大国的事情。如果能这样，这将是人类之福。

从那时起，荣渠的研究道路有了重大的转变，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主任了。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如其副标题所说，这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这本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炼，是一本十分有用的书。它使我惊讶地看到，我们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然而苦命的中国却竟还要在几十年之后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能看到荣渠写的《现代化新论》，现在要为他写的《美洲史论》急就章式地作序，也已经来不及补课，但是我相信他必有平实深入之论。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找到中国的病根，治愈中国的痼疾，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就是明证。

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本书中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大凡能懂得“发现”这个词儿的意义的人,也就会懂得这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发现”可以不要以世界史为参考系,那么美洲本来就是印第安人发现的,还有什么别的可说呢?然而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虽然多年以前,胡适就已痛斥其非,不过那还只是一个史学权威出于常识而发的义愤,而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已经一言定讫,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清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慎之按:在1957年以后,我已再不可能见到邓拓同志,但是我始终认为,博学明辨如他,1961年以马南邨的笔名在《燕山夜话》上发表的“慧深发现墨西哥说”,只是想使当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极度紧张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轻松一下。)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一篇考证文章,其实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荣渠通过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考核名物到穷研心理……详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是像这样通天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我们要继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就要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

哥伦布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才智如何,总之是历史选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天命选定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从他远航美洲开始(可怜他到死也不知道他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有了什么样的发现,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人类就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人类(Homo sapiens)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出于求生的愿望,在世界各地辗转流徙,在极其不同的地理气候与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语言、文化以至肤色、体质都各不相同的族群,尽管彼此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始终不断,但是直到1492年才发生了可以称为全球性

的大会合。以后发生的地理大发现,商业大革命,以至工业化、现代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统以此为动力和条件。识力超群的梁启超就看到哥伦布是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人物。但是哥伦布也成了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老祖宗,当然要因此而受到诟病与攻击。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可以由于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如改变成东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甚至多元主义即无中心主义,或者如熊十力解周易以“群龙无首,吉”为极致,均无不可,全看历史如何发展而定),但是,梁启超所谓西方“以动力横绝天下”500年的历史事实却是超乎价值判断之上而不可能改变的。哥伦布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只是到第一个500年结束、第二个500年开始的时候,全球化的概念才真正进入人类的意识,全球化是祸是福,正在开始引起全人类的注意。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特别痛感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仔细披阅老友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荣渠执教北京大学凡40年,培养了一些学生,我希望他们能继承他们老师的志业,真正做到薪尽火传。但愿我的希望不会止于希望。

1996年12月24日耶诞前夜

目 录

痛失良史悼荣渠

——《美洲史论》序…………… 李慎之(1)

论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 (24)

论美国革命的特点…………… (44)

殊途而同归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序…………… (59)

19 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态度…………… (64)

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

——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 (74)

查尔斯·比尔德及其史学著作…………… (104)

对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的思考…………… (112)

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131)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

——兼论文化传播问题…………… (166)

《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自序…………… (196)

附:考古学家夏鼐与罗荣渠论学的通信…………… (201)

世界之谜:谁在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 (209)

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

——15 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225)

面向探索新世界航程的第二个 500 年

——为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 500 周年而作…………… (251)

《哥伦布评传》中译本序·····	(258)
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	(260)
中美人民之间的早期交往·····	(298)
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	(302)
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	
——对美中关系的一种中国观点·····	(325)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	(334)
19 世纪拉丁美洲的中国“苦力移民”·····	(367)
历史上美国对古巴的野心和侵略·····	(398)
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	(408)
论西蒙·玻利瓦尔的世界历史地位	
——为美洲第一革命巨人诞生 200 周年而作·····	(419)
编后记·····	杨玉圣(436)

论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中美两国关系断绝了近 30 年之久，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但不相往来，而且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已经结束，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这不论从当前国际政治斗争发展的前景来看，还是从中美两国的贸易交往、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趋势来看，都是必要的。

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要想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日子里，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的。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过去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民过去的经历和最近的革命的观察是“近视”的，像“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看问题。^①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出版于 1948 年，最新的第四版出版于 1979 年。翻翻这本书可看出，在这 30 年中，作者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力图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中国。在最近的新版本中，更加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这种认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8 年英文版，第 2—3 页。

真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基础上，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历史。例如，亚洲学会的中国委员会所组织的“中美关系的历史透视”专题讨论会，就有许多专家参加，并出版了论文集。^①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改变了用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态度，在方法上也有某些改变，冷战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消除。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将有助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很丰富，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略论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中外关系史以中华民族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交往中，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200 年来的中美关系史也是如此。从 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来中国到 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贸易交往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和友好的。从 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到 1899 年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

^① 《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1978 年英文版。

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排斥华工问题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紧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这种侵略政策一直继续到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化，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并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结盟关系。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初，由于美国上层统治者某些集团敌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两国处于直接对抗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化的时期。70 年代初，美国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总之，两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好，也不能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坏。

就拿早期中美关系来说吧。这是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最初阶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贸易联系，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多，因此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较易处理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些著作中却认为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从“中国皇后”号通航中国，美国就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剥削——“海盗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据此，不但 200 年来的中美关系都应该被完全否定，而且恐怕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正常国际贸易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也要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必须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这 60 年间，美国的历史特点是：它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尚不独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但仍保持着独立富强的东方头号大国的架子。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

与当时中国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葡、西、英等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同中国发展贸易；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弱小国家参加欧洲国家争夺东方市场的角逐，又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中美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美国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不满3个月，一艘小帆船“哈里特”号就载运人参等物驶向广州，但未到中国即半途返回。1784年2月，从纽约港驶出了第一艘直抵中国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为什么美国人刚赢得独立就不远万里要到中国来通商呢？当时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农业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越过此山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满眼是森林和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这时美国外贸资源尚不丰富，资金缺少，13州又各自为政，财政紊乱，在经济上仍未摆脱英国的殖民地地位，独立以后，大量英国货涌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货的传统市场加勒比海等地，却被英国阻止难以进入。这个刚赢得独立的新民族不可能再依赖别人，必须开始自己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于是，它一方面披荆斩棘，向西部内陆进军；一方面深入大洋，去寻找新市场。就这样，美国一独立其商船就开始参加了欧洲国家商船的行列，涌向当时对西方国家最具有诱惑力的中国市场。从波士顿到纽约，原来定期行驶于加勒比海的双桅帆船，开始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开辟了通往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新贸易航线。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不大的木制帆船，重360吨，由私掠船改装而成。它装载约30吨人参、2600张毛皮、316担棉花及其他货物，由纽约起程，经好望角驶向中国。沿途停留一些口岸，历时半年，于1784年8月28日抵广州黄埔。当时停泊在港口的欧洲国家的船只对第一艘美国商船的到来，莫不感到意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在此以前，中国人分不

清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知道英美两国之不同后，就把这远方来的客人称为“新国民”。美国人拿出地图指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后，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这次航行的管货员、陆军少校山茂召（亦译作山姆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中美人民友好问候的记载：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人，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①

这段对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亲切的、发人深思的。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呆了4个月，年底返航，满载茶叶、棉布、瓷器、丝、肉桂等货物。1785年5月11日船抵纽约港时，向城市鸣炮13响致敬。第一批由美国船运回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次首航的投资是12万美元，赢利30727美元，利润率为25%。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正如山茂召给国务卿的信中所写的：“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1922年英文版，第89页。

的信息。”^① 当时这个新国家处处都受英国的歧视，因此首航中国传来的好消息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会内外的极大重视，参加首航的山茂召在 1786 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此后，在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要知道，当时这种远洋贸易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行。美国参加远东贸易的帆船一般不超过 300 吨，有的甚至不到 100 吨，没有详细的海图，航海工具也很简单，航行途中要冒极大风险。往返一次常常要一年多时间。但是，远东贸易的优厚利润吸引了大西洋岸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在这一时期，美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对于伦敦大街、里斯本的码头和广州商行的景色，比对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和清除树桩的工作还更为熟悉。美国参加早期中美贸易的商船，很多是过去搞走私贸易和有过海盗生涯的私掠船。但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基本上是按正常国际贸易交往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美国对华贸易说成是“海盗式的掠夺”。至于说美国商业资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惟利是图，资本的来到美国也沾满血污，这在美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著作中也是不加以粉饰的。但不论美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怎样贪婪牟利，敲诈勒索，都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是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到得很晚的一个国家，但它的对华贸易却发展得很快。从 1791 年到 1841 年 50 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 6 倍之多。^② 由于美国船小速度快，特别是飞剪快船这种改进的帆船参加竞争之后，经营效率提高，船员们又富于冒险精神，因而后来居上，很快就越过法、荷、丹、葡等国，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在早

① 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1909 年英文版，第 28 页。

② 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1930 年英文版，第 114 页。

期贸易交往中，美国商人基本上能遵守中国的限令，声誉比英国商人好。中美商人间的关系也较友好。有一艘美国飞剪快船，以当时广州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的名字命名为“浩官”号，由此可见一斑。

1821 年发生美船“急呢仑”（Emily）号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的人命案，在中国当局的强硬要求下，美船被迫交出该水手，后被中国法律审判并处死。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完全行使了自己的主权。而随即发生的英国水手在混斗中杀死中国人一案，英国当局却拒不交出凶手。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之不同。

通过早期对华贸易，美国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这对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困处境，促进东部一些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贸易往来也是有利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美国是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等商品的市场。在 1805 年至 1815 年 10 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 2270 万多美元，货物仅值 1000 万美元。这就是说，金银两倍于货物的进口。^① 不仅中美贸易的情况如此，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也是中国连年出超。据估计，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尤其是到 1830 年左右，至少有 5 亿元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② 同西方的贸易也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茶、生丝和丝绸等的发展。这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是互利的。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限制中外贸易往来和竭力隔绝同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而是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而改弦更张——哪怕是处于被迫的形势下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是一种样子。

早期中美贸易往来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但

① 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 年万有文库本，第 2 页。

②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 年中译本，第 3 卷，第 2 页。